

鐵血精忠傳 (三)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日寇的剋星特務處

民族復興運動的目的，在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加強民族的信心，收復失地，抵抗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這項運動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情報工作。要想完成這項運動，就必須做到知己知彼，因此成立了特務處，專負其責。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點鐘，委員長蔣公在南京中山陵園召見戴笠，告訴他：「主持特務處的工作，已經保舉六個人，我認為祇有人才適宜，能够做好這種工作。」

「報告校長！」戴笠趕緊向委員長報告：「我不能做這個工作。」

「爲甚麼？」委員長問。

「團體當中，許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而且這種工作本身就不容易做好。」

「這不要緊！」委員長說：「一切有我，不必顧慮。現在就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祇要有決心，事情一定可以做好。」

「報告校長！」戴笠說：「就黃埔的關係說

，你是校長，我是你的學生；就革命的關係說，你是領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祇有絕對服從命令，盡我自己的能力來做。」

不到一刻工夫，委員長就下了正式的命令，叫戴笠組織特務處。

他雙手接到命令，對委員長這樣信任他，抱定必死的決心來做好這件工作，很感慨地向委員長報告：「從今天接到了命令之日起，我的這個頭就拿下來了。」

「爲甚麼？」委員長很奇怪地問他。

「這個工作做得好，頭一定給敵人殺掉！」戴笠說：「故不好當然要給領袖殺掉！」

在從事民族復興運動的黃埔學生當中，戴笠和劉誠之的期別最低，都是第六期。現在把這樣重要的責任交給他負責，必定會遭受妒忌，果然不出他所料，有一位同學很不服氣。第二天上午，那位同學對戴笠說：「關於特務處的人事和經費，校長要我負責。」意思是說，以後一切，你得聽我的。

第三天戴笠向委員長辭職，沒有准，非要他負責不可。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這個「殺敵鋤奸，鎮壓反動，安定社會，鞏固抗戰」，日本軍閥的剋星特務處正式成立。戴笠住在鷓鴣巷五十三號，原是胡宗南的駐京辦事處，借幾間房子給他住，現在全部讓給他，成了他的住宅和接洽處，另外在徐府巷成立了辦公處所。

特務處之下有書記處，由唐縱任書記，兩個科，鄭介民任偵查科長，邱開基任執行科長，後來增加了交通科，梁幹喬任科長。戴笠的個性，說幹就幹，非常負責，開始布置工作，最初的陣容是：

南京：方超、陳莫南、鄭重民、李翼謀、左曙萍、陳遠湘、朱金驊、蕭堅白、漆中權、張開運；

上海：翁光輝、張業、鄧匡元、姜穎初、甘唯奇、徐昭俊、吳時春、董聖貴、唐光輝；

京滬路：徐亮、趙世瑞、彭緒之；

徐州：胡天秋；

海州：岳燭遠；

淮陽：王啓明；

杭州：胡國振、潘海容、章洪濤；

溫州：石鍾毓、華興弘；

安慶：倪超凡；

蚌埠：蔡慎初；

南昌：柯建安；

贛州：喻耀離；

撫州：謝鎮南；

武漢：周偉龍、蕭勃、劉培初、許千秋；

長沙：蔣肇周；

汴洛：劉藝舟、劉暨、李景亭；

濟南：李郁文；

青島：姚公凱、張新齋；

煙臺：劉乙光、武建威；

津浦路：高振鵬；

膠濟路：鄭興周；

天津：王天木、靳汝民、翁一揆、李思遠；

北平：陳恭樹、楊英、齊慶斌、王雲蓀、戚

南普；

太原：靳易夫、喬家才、張存仁、梁怡亭、

吳毅安；

西安：賈文郁、趙景雲；

歸綏：王和衆；

香港：吳迺憲、張炎元；

廣州：邢森洲、蕭漫留、張覺時、阮兆輝

；

廈門：連諫。

這是一個相當堅強的陣容。

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國比較重要的地方，都

有了他的工作同志，展開工作，真是一個好的開

始。

特種工作及其使命

革命領袖蔣公曾經說過：「特種工作人員是領袖的耳目。」

「特種工作人員是革命的靈魂。」

「特種工作人員本身在政治上沒有主張。」

所以，特種工作人員的一切絕對聽命於革命領袖，為完成革命而奮鬥。戴先生以「秉承領袖

意旨，體念領袖苦心。」來勉勵同志，始終不懈。

戴先生說過，一位朋友同他開玩笑：「你在中國，就等於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萊。」

「你這是甚麼話？」戴先生說：「我為甚麼要做希姆萊？我是中國人，中國特種工作自有中國特種工作的精神，為甚麼要模倣德國？」

中國特種工作的精神和使命是甚麼？戴先生自己解釋的最清楚，戴先生說：

「我們這個團體決不是採取俄國『格伯烏』德國『吉士塔坡』的特工方式來統制的！因為中國有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傳統精神。中國人傳統的精神是甚麼？總理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領袖講『禮義廉恥』。我們掌握團體，運用組織，就是本着這種精神做出發點。

以（三民）主義領導，以理智運用，以情感結納，以紀律維繫。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主義與道德的結合凝為一體，愈久愈堅，誰——不論是日本人、汪精衛、共產黨——都沒有辦法來破壞我們。」

又說：「現在社會上厭惡懼怕特工，是絕大的錯誤。特工只不過是共生死、共患難、共目標、共步驟的組合，組織嚴，紀律嚴而已，有甚麼可怕呢？」

既然組織嚴，紀律嚴，戴先生對於同志們的要求，當然要嚴格，」再提醒同志們，本身所擔負的革命任務，他說：

「我們則不然，一方面要拿這個工作，來鞏固革命政權，促成國內統一，與一切反革命勢力相搏鬥；一方面又要拿這個工作來整頓我們這個破敗的國家，跟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賭輸贏。中國特種工作就是在這種時代使命和革命任務之下而產生的。」

「我以為我們中國特種工作與世界各國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特種工作人員要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的道德，復興中華民族，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為職志。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言論、我們的行動，乃至待人接物各方面，處處都要合乎革命救國的要求。由我們本身做起來影響社會，推而至於全國，蔚為風尚。我們不僅是革命的技術人員，而且在精神上要做到是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主力軍，這幾句話就是我們的工作意圖。」

中國特工不同於外國的地方在此。

「在外國，特務工作人員，有福享盡，有錢用盡。可是中國特種工作人員就不同，我們要儘量能够吃虧，格外能够吃苦，然後才能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固有的道德。實行三民主義，才能求得中華民國的復興。今天外面的人都知道，我們同志的生活很苦。雖然很苦，還是

在埋頭苦幹，沒有話講，覺得這班人不可輕視。因此，我希望我們同志，更要硬着頭皮，咬緊牙關，困心衡慮，發奮自強，千萬不要中途變節，以致前功盡棄。」

「甚麼叫做特種工作？特種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為者我能為，人之所不屑為者我屑為，人之所不願為者我願為，人之所不敢為者我敢為。我們要以特殊的工作成績來表現，這個叫做特種工作。」

這就是特種工作人員的精神不同於一般的所在。

洪公祠和浙江警校

特務處成立以後，需要一批忠貞的幹部從事工作，因為這種工作不是隨便可以做好的，必須有道德的修養，意志的鍛鍊，技術的訓練，理論的學習，是需要經過一番訓練的。

特務處呈准設立特種警察訓練班，隸屬於參謀總長，以王固磐為主任，戴先生兼總務課長，負責實際責任，鄭介民為教務課長，李士珍為訓育課長兼學員隊隊長，鄭國琛為指導員。地址在洪公祠，受訓學員大部分為黃埔同學。第四期的廖宗澤、劉弋光，第五期的陳恭澍、喻耀離，第六期的唐光輝、楊英等。訓練方式，技術和精神並重，培植了第一批民族復興運動的特種工作幹部。

戴先生又以為特種工作和警察是分離不開的，警察是民衆的保姆，負責維持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寧，是防止犯罪，緝捕作奸犯科的主要力量。

量。

特種工作和警察相結合，才能發揮工作效能。但是舊社會的警察，不特沒有革命思想，民族意識，就是警察所負的責任，也是模糊不清。甚至和惡勢力相互勾結，魚肉民衆，欺壓善良，為害社會。所以，戴先生在負責特務處工作以後，同時以整頓警察，培養革命警察幹部為己任。

六月間，戴先生奉派為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由書記長王孔安主持，後由汪祖華繼任。

浙江杭州警官學校係十七年朱家驊先生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長時所創辦，目的在培養浙江省的地方行政幹部。最早一期為速成科，學員成分，有黃埔軍校五期以前的同學，有在社會上已有工作經驗的文武青年。

速成科為短期訓練，畢業學員有王玉賓、阮清源、劉漢東、靳易夫、張精一、蕭昭文、吳健吾、夏松、舒翔等，其中大多數人都成為戴先生的重要工作幹部。

浙江警官學校校長先由王固磐接替，後為趙龍文；教務主任先為趙龍文，後為鄧裕坤；訓育主任先為史銘，後為柯建安。政治指導員為簡樸、汪祖華。

戴先生擔任政治特派員以後，即以浙江警官學校為建警的基礎，培養革命警察的搖籃，同時也成了訓練特務處工作幹部的秘密基地。

戴先生訓練特種工作幹部，從南京移到杭州，以浙江警官學校為掩護，設甲、乙、丙三種特訓班及電訓班。甲訓班和電訓班設在雄鎮樓，和

警校完全隔離。甲訓班選訓警校優秀正科生及各地重要幹部，半年一期，每期三四十人，由余樂醒、謝力公主持，廖宗澤任隊長。電訓班由魏大銘主持，董益三任政治指導員。

乙訓班、丙訓班設於警校內，訓練行動工作幹部。

建立無線電通訊網

特務處成立之初，沒有無線電通訊機構，各地報告南京的重要情報，奉准由中央黨部調查科的電臺代為拍發。譬如太原拍發的電報，須交調查科的交通帶到石家莊，由掩護在鐵路黨部的電臺拍發。而調查科的電臺，當然是先發他們自己的電報，特務處的電報在時間上落後了許多。這也是人情之常，無可奈何的事。不過情報是有時間性的，失去時間性，就毫無價值。

用軍事委員會的發電紙向軍政部的軍用電臺發報，也常遭到留難，據魏大銘說，他在南京，暫住軍政部電臺內，臺長是他的同學，就曾告訴他：「交通司會懷疑這個戴某人，不知是什麼路道，恐怕是亂黨，將不給他發電報。」

所以戴先生計劃建立自己的無線電通訊網，是非常迫切的。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魏大銘主持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前線後援組的電臺，他發報手法均勻、清楚、快速，曾在外輪上工作過，稱為中國的兩個半無線電好手之一。當時第一師駐在常州，師長胡宗南請總司令部交通處長李範一介紹一位無線電人才，李又請建設委員會王崇植介紹，王於是介紹魏大

銘，到了第一師工作。淞滬戰爭結束，第一師開往甘肅天水，魏大銘不願意到西北去，胡宗南就把他介紹給戴先生。

魏大銘參加特務處的工作以後，首先着手訓練無線電幹部，在杭州雄鎮樓成立電訓班，請康寶煌、蘇民、謝松元等任教官，羅毅、蕭堅白先後任隊長，羅杏芳、董益三先後任指導員。第一期十二人，丁祥峨、葉文昭、趙文琦、朱昌誠、童學南、張培蘭、陳梅春、陳漣、戴梁、陳舜齊（以上十人杭州警官學校第二期畢業）、杜炳漢、戴永安。

第一期畢業後，魏大銘感覺到警官學校畢業學生的志趣，不適合學習無線電技術，決定在上海設立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招訓年輕有志無線電的青年。再從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挑選優秀的入杭州電訓班，這樣既容易吸收人才，也可以縮短訓練時間，可說一舉兩得。

杭州電訓班從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開始，到二十六年抗戰，一共訓練了十一期。二十七年在武漢招考各地流亡青年一百多人，開始第十二期訓練，以應戰時急需。這一期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國大代表郭宗泰、前空軍監察總隊長陳顯達，交通部電報局督察主任徐國華、以及嚴行威、夏曉華、費雲文、高雄鉛廠人事處副處長張依道等。

因為戰時需要的人員太多，必須大量訓練，程浚在江津訓練兩期，四百二十人；王正鐸、袁志山在重慶訓練二百四十二人；黃冕在建甌訓練四百三十五人；林郁民在息烽訓練三百零七人；

王正鐸在金華訓練六十一人；花克強在南平訓練七十七人；秦世賢在西安訓練二百零四人，才使報務人員不感缺乏，應付了長期戰爭的需要。

製造袖珍「特工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供獻。

康寶煌是一位智慧特別高，才能特別強的無線電工程師；他先做通訊工作，再進交通大學。魏大銘覺得普通無線電機太過笨重，頂小的手搖發電機式五瓦特和充電發電機式十五瓦特兩種電機，都感覺攜帶不便，不適合於秘密工作使用。於是和康寶煌研究，製造一種小型收發報機，康寶煌說：「把收發報用的真空管的電壓 (Plate Voltage) 提高一倍，就可有訊號發出來，其電力雖微小，也可以試試看。」

經過試驗，康寶煌的理論成功了，製造出軍統局敵後使用的「特工機」，除去電池、聽筒、電鍵外，收發報機祇有兩只小餅干筒大小。這種創作，奠定了軍統局的秘密通訊網，發揮了極大的功效。康寶煌對於軍統局的貢獻，是非常偉大的。

戴先生要使委員長知道他手下有人才，在無線電方面有特殊的成就；為爭取成立無線電機製造所，預算容易批准；為使魏大銘得到委員長的鼓勵，安心工作；為說明情報工作，非靠秘密通訊不為功，非培植這部門工作人員不可。基於以上種種理由，二十二年暑期，委員長在廬山主持訓練團，戴先生要魏大銘攜帶特工機上廬山和南京通報，並且謁見委員長報告詳情。

廬山牯嶺的無線電通訊，是有名十分困難的

，至少要用十五瓦特的電機，還是常常通不到，電報耽擱一兩天，不算稀奇。因為廬山的天氣特別，忽然會漫天大霧，幾尺以外看不見人。在雲堆裏，電力損耗太大，發射不出去多少。牯嶺臺和總臺花克強通報，花克強是位好手，一手抓住收報機的刻度盤，隨聲音飄移，還須轉移捉住，一點一滴抄下來，已經滿頭大汗。魏大銘到牯嶺以後，先把發報天線架設加以改進，使發射出去的電力強一點。他自己上機，和花克強通報，他的手法清楚均勻，在天電干擾聲中，容易抄下來。當雲霧濃厚的時候，他先要總臺發報，天氣一清，趕緊要總臺收報，牯嶺儘量發出去，這樣才上了軌道。

一天下午四點多鐘，魏大銘正在電臺工作，戴先生的副官賈金南跑來告訴他，委員長四點半鐘召見，和戴先生一塊兒去，恐怕時間已經遲了。兩個人去到蘆林三十四號官邸，果然委員長剛走出大門，出去散步。戴先生和侍從人員約安第二天上午十點再來晉謁。第二天，他們抵達官邸，侍從人員說：「剛才有位客人進去，委員長一下子就會出來，就在草坪上等等吧。」

一會兒委員長出來，戴先生指着收發報機，向委員長報告說：「現在牯嶺通報的電臺，就是這個電機」。

「好好！」委員長看見收發報機那麼小，很高興的樣子，點點頭，對魏大銘說：「我會給你任務的，你好好幹吧！」

九月間戴先生要魏大銘編造預算，向委員長請求開辦無線電製造所。魏大銘編造了一份兩千

多元開辦費的預算，很快就批准了。就在雄鎮樓購置工具，開始生產兩瓦特半的特工機，一架祇費兩百元，真够得上物美價廉。另外又研究出將普通的無線電收音機改裝成發報機，在大都市購買收音機改裝，可以省去攜帶電機器的危險，也是很大的貢獻。康寶煌離開製造所以後，由陳景涵主持。

為補救各地秘密電臺電機弱小，總臺發報機的電力要大到一百到兩百瓦特，收報機須七八燈以上，以彌補各分臺電機的弱小。起初總臺設在南京洪公祠，後來改設在城南白鷺洲西石壩街二十九號，收發報機增加到八架，收發報臺間聯以電線，可以在收報臺操縱發報機，可通兩千里以內各地分臺。白鷺洲總臺於二十二年冬天完成，由于熾生主持。他人老成持重，忠厚和善，無火氣，耐性好，所以能統率許多通訊好手，專心工作，建立了很好的風氣，電報沒有耽擱，錯誤也很少。

戴先生從來不干預電臺的工作，一切都由魏大銘全權辦理，他用人專，信人深，使魏大銘不能不把一生的精力貢獻給這個革命團體。抗戰期間，淪陷區域分臺增加到三百多座。上海一個地區就建立了十一座秘密電臺，北平有三座秘密電臺，始終在程凌和查綏之極機智的維持之下，不因當地工作被破壞而受影響。天津也因李仲英的努力，在驚濤駭浪中，能够維持工作。他如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緬甸、泰國、印尼、印度、菲律賓都有秘密電臺，始終暢通無阻。

希望做校長的衛士

戴先生在黃埔入伍的時候，有一天，和幾個同學在一塊兒聊天，各人敘說各人的志願。有的要訓練好一支精壯的部隊，作為將來做方面大員的資本；有的外文根柢很好，將來要做武官，好活躍國際，週遊世界；有的說他來黃埔，祇是爲了革命，並不想幹軍人，將來要搞政治。戴先生靜靜地坐在那裏，聽人家大吹特吹，沒有開腔，有人問他：「老戴！你怎麼樣？」

「我希望將來做一名校長的衛士！」戴先生說完，大家忍不住都笑起來了。一個黃埔學生，祇希望當一個衛士，真是豈有此理，太沒有出息。後來戴先生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徐亮，他說：「校長一身關係革命的成敗，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還有比衛護校長安全更重要的工作嗎？那班有志氣，有抱負，想做方面大員，要活躍國際的外交家，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真正革命的。」

這一年——二十二年七月，廬山開始調訓全國的軍官，委員長親自上牯嶺主持，戴先生擔心委員長的安全。他想到衛護委員長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立刻在他領導的工作同志中間，挑選了十名忠貞、機警、強壯的黃埔同學，組織隨節警衛股，以黎鐵漢爲股長，曾澈爲書記，負責衛護委員長的安全。後來人員增多，工作加強，改爲特別警衛組，成爲經常的警衛機構，日夜擔任勤務，實現了他當年要做校長衛士的宿願。

戴先生不同於常人的地方，就是處處爲別人

打算，不僅對委員長忠貞，對朋友、對同志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這一年秋天，邱開基接到一封家信，告訴他，老太太已經安葬，因爲有他匯回去的兩千元治喪費，喪事辦得非常體面、完滿。親戚鄉黨異口同聲贊揚他，說他雖然請假不准，可是匯回那麼多的錢辦喪事，在他們雲南景東，可說是空前壯舉。人人個個都說：「老太太有這樣一個好兒子，死也可以瞑目了。」

邱開基這個時候才知道，他的母親逝世了。養生送死，是中國人做人的起碼孝道，母死不會奔喪，兩個月以後才知道，總是終身遺憾，非常難過。他最奇怪，最不了解的，他並沒有滙過兩千元治喪費。在他們景東家鄉，生活費用低，辦理喪事，不論怎麼鋪張，也不需要兩千元，就是一千元也用不了。這筆錢究竟是誰滙去的？想來想去，這種大手筆，除了戴先生，別人是辦不到的。那麼，這筆錢是不是他滙去的，不妨去問問他。

「戴先生！」邱開基問：「你知道不知道我母親去世了？」

「知道。」戴先生毫不遲疑地回答他。

「剛才接到家信，說我給家裏滙去兩千元治喪費，但是我並沒有滙過這筆款子，連我母親去世，都是剛才知道的。我很奇怪，你說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想想看！」戴先生並沒有回答邱開基的問題，却反過來問他：「假如你請假回家奔喪，從南京到你們雲南景東（那時粵漢、湘桂等鐵路都沒有修通）打個來回，頂快也得三個月吧？以

你現在所負的任務，能請准三個月假期嗎？請假不准，母死不能奔喪，你精神上怎麼樣？能安心工作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邱開基無話回答，然後接着說道：「因此，我當時決定，暫時不讓你知道這個消息，以免影響你的工作情緒。辦喪事，最要緊的是錢，有了錢就好辦事。我知道你家並不富有，需要錢辦事，需要你回去還重要。而你又沒有積蓄，你回去也未必能籌出一千八百。所以，我替你滙了兩千元治喪費，有了錢，自然有人替你辦喪事。同時我又替你發了一份電報，告訴你家中，因路途遙遠，往返費時，請假不准，奉命移孝作忠。我想，你一定會同意我這樣處理？」

又如委員長在漢口主持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事，有一天，負責童子軍總會和朝鮮革命幹部訓練的干國勳乘了一架水上小飛機，赴漢口晉謁委員長，戴先生也同乘這架飛機。飛機非常不穩定，上下顛簸，在空中跳舞。起飛四十分鐘，干國勳被顛簸得嘔吐不已，戴先生立刻脫下身上的襯衣，為他擦抹嘔吐污物。到達漢口，干國勳已經動彈不得，戴先生把他背上岸，再抱上汽車，送到東方飯店。又趕快到華南街銀行公會三省剿匪總部，替他登記晉謁委員長的時間。返回旅館時，又為他買回替換的衣褲，照應他洗過澡，吃過點心，才恢復了體力。這兩個故事說明戴先生照顧朋友的具體事實，充滿人情味。

十九路軍發動閩變

「九一八事變」，不經抵抗，日本軍閥就佔領我整個東北。侵略成果這樣容易獲得，食髓知味，第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發動「二二八事變」，妄想一舉佔據我上海，威脅我首都南京，好強迫我們簽訂「城下之盟」。先是藉口我們抵制日貨，上海日本浪人、僑民和海軍陸戰隊遊行示威，搗毀我們的商店、工廠；既而說我們打傷了兩個日本人，日本領事中村向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想作為侵略的藉口。終於鹽澤海軍司令命令陸戰隊攻擊我開北天通庵駐軍，展開淞滬戰爭，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三十日我政府宣言遷洛陽辦公，決心抵抗侵略。

上海駐軍為十九路軍，抵抗侵略的責任，當然落在他們肩上。於是，全國民眾都以為十九路軍抵抗日本侵略，把他們當做民族英雄，熱烈擁護。其實戰爭一開始，委員長就急調第五軍增援，如二月二十二日，第五軍的八十八師俞濟時所部固守廟行鎮，戰事激烈，英勇抵抗。敵軍無法進展，急電東京乞援。所以一二八淞滬戰爭，自始至終，都是第五軍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而抵抗日本侵略的榮譽却由十九路軍所獨佔。全國對他們捐款，捐送物資，表示慰勞，十九路軍真是名利雙收。

五月五日中午停戰協定簽字，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蔣光鼎為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十九路軍移防福建。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會議決議調蔣光鼎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鍇繼任福建綏靖公署主任。政府對於十九路軍，真是天高地厚，他

們應當怎樣善保榮譽，效忠國家才是。誰想他們憑藉全國民眾對他們的好感，會勾結共產黨和蘇聯，背叛國家，造起反來呢？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二十六日，蔣光鼎、蔡廷鍇和盤據江西瑞金一帶的共產黨毛澤東、朱德簽訂攻守同盟的「抗日作戰協定」，十一月二十日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鼎、蔡廷鍇發表通電，宣佈脫離國民黨，自組生產黨。在福州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以李濟琛為主席。陳銘樞為行政委員會主席，陳友仁為外交部長，章伯鈞為教育部長。並改十九路軍為「人民革命軍」，以蔡廷鍇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黃琪翔為參謀總長。

這時候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已經成了氣候，有了基礎。十九路軍開始醞釀閩變，他們的一切行動，就被完全掌握。蘇俄唯恐中國不亂，當然支援他們顛覆政府，答應給他們步槍三萬支、輕機槍四千挺、砲兩百門，以及彈藥和各種器材，以補充十九路軍和共產黨。由海參威裝船，一直運往廈門。這些武器在海參威集中情形，以及何時裝船，戴先生都有確實情報。

戴先生要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戰略，不要流血，結束閩變。雖是牛刀初試，確有把握。他要在蘇俄的武器彈藥沒有運抵廈門之前，先瓦解叛軍。福建籍的同志何震、連謀、張超等已先後派回福建工作。

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的參謀長趙錦雲雲南人，和毛維壽是保定同期同學，做過黃埔軍校的管理科長，因為雲南同鄉關係，和邱開基交情很深

。邱開基把他介紹給戴先生，負責策反毛維壽及正，中央已答應任命毛為五省剿匪軍第七路軍總指揮。戴先生並偕周昭瓊赴廈門，潛在漳州和毛維壽及六十師師長沈光漢晤面。蔡廷鍇的參謀長黃強為周昭瓊的姑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員長蔣公飛臨福建浦城，親自指揮討逆軍事，戴先生為配合討逆行動，讓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六十師師長沈光漢於二十

三年（一九三四）一月二十一日發表通電，擁護中央，促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早日出國。這兩個師是十九路軍的主力，因為他們表明態度，十九路軍藉以叛亂的憑恃瓦解了，閩變像曇花一現，很快就結束了。

蘇俄準備接濟閩變武器的船隻，已經起碇，因為他們瓦解的太快，出乎老毛子想像以外，這一批武器沒有達到廈門，江西的共產黨也沒有分

到一杯羹。共產黨的援閩部隊，也只好退回江西老巢。

閩變爆發的同時，共產黨的黨羽黃天燾、鄭藏等人在武漢利用「武漢農學會」做掩護，秘密組織「人民政府武漢分會行動委員會」、「生產黨武漢支部」、「第三黨民主革命同盟」、密謀響應，也被特務處的漢口站破獲了。

× × × ×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壹幣肆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宛、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定價台幣肆拾元。

談戴笠將軍的名著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之廿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定價伍拾元

喬家才先生從事情報工作多年，他曾是北伐、剿赤、抗戰、戡亂時期的無名英雄，戴笠將軍極親密的戰鬥夥伴。冒險犯難，出生入死，足迹遍大河南北，長江兩岸，有數不清的英勇偉烈事迹，可歌可泣的經歷。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包括：「空前國難」「華北之行」「陪都重慶」「太行兩年」「陝西緝私」「後套練兵」「太原肅奸」「將星殞落」等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